忻州古城的历史变迁与功能探究

◇ 谢红萍　高宏进

忻州古称九原、新兴、秀容，州城历代多为郡、州治所在。其处于农耕文明与游牧文明交汇地带，是中原通往塞外的重要咽喉要道，历史文化底蕴深厚。随着历代王朝的更迭，忻州城市的功能也在不断发生转化。从战略地位而论，忻州南接太原、内靠三关，自古就有“省会藩屏”“三关锁钥”之称，是历代必争的军事要地。从经济贸易而言，忻州城是晋北地区的茶马古商道的支点城市；从建筑价值看，古城内的传统建筑类型丰富，具有较高的艺术价值。研究忻州古城的历史变迁，厘清忻州的历史文化渊源，把握当地的文化特色，挖掘多元文化内涵，有助于打造具有独特魅力的历史文化名城。

忻州古城的历史变迁

（一）东汉“初置”，胡汉杂居的边郡

忻州古为冀州之地，春秋前期为戎狄所居，后属晋，三家分晋之后归赵所有。秦庄襄王三年（前247年），初置太原郡，本境是其辖区。西汉至东汉前中期，本境为太原郡阳曲县地。忻州有正式的行政建置始于东汉末曹操设置新兴郡。

东汉时期，匈奴内部发生分裂。从汉安帝永初三年（109年）到灵帝中平五年（188年），入居山西的南匈奴部落内部冲突加剧，不断袭扰内地边郡，其部众纷纷随首领南迁，大多数集中到并州中部的汾河流域一带。南匈奴的侵袭、内迁直接造成沿边诸郡人口流失、土地荒芜。《晋书·地理志》载：“灵帝末，羌胡大扰，定襄、云中、五原、朔方、上郡等五郡并流徙分散。”大批汉人向内地逃亡造成沿边县邑空虚，编户耗减，使得统治者致力于安抚流民，兴复县邑。《三国志》记载：建安二十年（215年）曹操集塞下荒地，“省云中、定襄、五原、朔方郡，郡

置一县领其民，合以为新兴郡。”郡治为九原，这是最早的忻州城。

新兴郡是曹操为纠集流民而专门设置的郡，这既是对东汉政府以往治边之策的沿袭，又是基于边地荒废、人口流散的状况作出的编户流民、发展生产的重要决定。在招抚南匈奴之后，曹操将匈奴部众分为五部，诏令他们散居并州太原、西河、雁门、新兴和司州的河东等六郡。《晋书·四夷列传》载：“岁给丝绢钱谷……其部落随所居郡县，使宰牧之，与编户大同，而不输贡赋。”此时忻州境内汉族流民与北部匈奴共同生活，成为曹魏政府统治下的“编户”，从事农业耕作。

东汉置郡是忻州城市形成过程中的一大节点，这一时期匈奴与汉族人民共同生活在忻州这块土地上，开垦荒地、发展生产。以此为起点，忻州逐渐成为北方游牧民族与中原农耕民族相互碰撞与融合的前沿。

（二）魏晋动乱，多民族融合的前沿

西晋代魏后，九原仍属新兴郡。晋惠帝元康年间（291—299），新兴郡改名为晋昌郡。如《大清一统志》忻州条云：“新兴郡，元康中改为晋昌郡，寻复名。”晋武帝太康十年（289年）司马炎改五部帅为五部都尉，诏以刘渊为北部都尉，新兴郡成为匈奴刘渊部族势力盘踞之地。东晋十六国时期，本境仍为新兴郡九原县。先后为前赵、后赵、前燕、前秦、后燕所据。

地处汉民族与草原民族的结合地带，也是旱地农业与草原游牧的融汇之处，新兴郡早在十六国之前就是匈奴与汉人杂居之地。两晋十六国时期，作为进入中原地带的通道，新兴郡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故而境内战乱频发，其先后归属匈奴、鲜卑、羯、氐等多个少数民族政权，加上原有的汉族政权，可见其势力结构的庞杂，如此也造成了境内居民结构的复杂。《晋书·北狄匈奴传》记载：“晋泰始元年（265年），塞外匈奴大水，塞泥、黑难等两万余落归化，帝复纳之，使居河西故宜阳城下，后复与晋人杂居。由是，平阳、西河、太原、新兴、上党、乐平诸郡，靡不有焉。”另外忻州有呼延村，此匈奴之姓也。今有单姓“呼”者，乃呼延之单称。呼延氏是匈奴大贵族，刘渊的母亲就姓呼延。另外忻州还有村名叫做“部落”，这些皆是古代少数民族南迁入塞后定居忻州的证明，同时亦是魏晋之际，忻州民族融合的表现。

（三）南北朝时期，帝都的近畿地带

北魏建立后，建都平城，新兴郡就成为帝都的近畿地带。北魏政府于此重新划分郡县，以加强行政控制。太平真君七年（446年），本境设肆州，州治九原。北朝时，本境隶属肆州，除了行政规格得到提升之外，境内的政治、军事力量也得到加强。《魏书·地形志》称：“肆州，治九原。天赐二年（405年）为镇，真君七年（446年）置州。”严耕望也称九原即九原镇，后变更为肆州。

肆州九原地区是北朝时期的军事要地。忻州九原岗北朝壁画墓的发掘，为九原地区的重要性提供了一手史料支撑。壁画墓中有林间营寨图和狩猎图，展示了北朝士兵真实训练场景。壁画中的忻州森林茂密，林间营寨旗帜飞扬，表明此地驻扎有大量武士，可见此地军事位置的重要性。而且北朝时期忻州拥有大量的马匹，据《北齐书·白建传》记载："北齐河清三年（564年），突厥入境，代、忻二牧悉是细马，合数万匹，在五台山北谷中避……"马匹于战争而言，是必备军需。作为天然牧场的忻州必然会为统治者所重视。

（四）隋唐明清时期，繁盛的州郡治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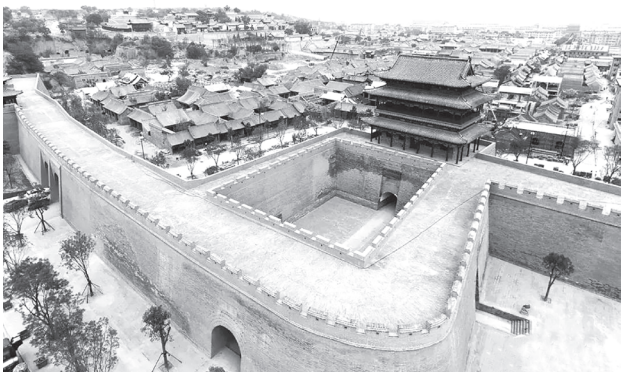
隋朝开皇十八年（598年）始置忻州，唐代亦称忻州。五代十国时期，本境仍为忻州秀容县。先后为后唐、后晋、后汉、北汉所统治。宋为忻州秀容县。金元亦为忻州秀容县。明为忻州，省州治秀容县入州。清为忻州直隶州。

从隋唐一直到明清，本境为忻州，忻州作为州郡治所的繁盛在这一阶段逐步展现。首先表现为城池的修缮与建设。东汉建安二十年（215年）曹操迁聚塞下流民至九原城，与汉人同居。但此时的九原城四周只是土垣，并不具备后代城市所承载的区域中心的作用。唐宋之际，忻州城得到了初步建设，据《忻州直隶州志》记载，当时忻州城"周九里二十步，城高二丈九尺，墉基三尺，池深一丈七尺"。明洪武到嘉靖十六年（1537年），当地任职官员对忻州城进行了加固修葺。洪武三年（1370年），钟友谅任忻州知州时"创制立法，修举城郭"；嘉靖十六年（1537年）李用中任忻州知州时"修庙学、葺城垣，劝农课桑"；明嘉靖二十八年（1549年）到清同治七年（1868年），忻州城进行了大规模修缮，史称"三展卧牛城"。另外忻州知州谢廷琪、沈廷珍、华典等人分别于乾隆九年（1744年）、乾隆十八年（1753年）、道光三十年（1850年）对忻州城进行过不同程度的修缮。这一过程中，忻州城的布局不断完善，规模逐渐扩大，奠定了这一城市的基本格局。

其次还表现为忻州城文化事业的蓬勃发展。宋元之时，忻州人口繁盛，文化教育蓬勃。宋代忻州秀容是河东北路地区唯一的"紧"级城镇，《文献通考》记载："建隆元年，应天下诸县除赤、畿外，有望、紧、上、中、下之分（四千户为望，三千户为紧，二千户以上为上，千户以上为中，不满千户为中下，五百户以下为下也）。"金代忻州全境内人口密度更是高达58.06人/平方公里，可见当时忻州人口的繁盛与经济的发展。金元之际的文学大家元好问在金灭亡之后，回到秀容，其碑铭记载："汴梁亡，故老皆尽……先生遂为一代宗匠，铭天下功德者，尽趋其门……为《杜诗学》《东坡诗雅》《诗文自警》等集，指授学者。"故而当时的秀

容也称得上区域文化教育中心。

再次表现为明清之际，忻州城手工业和商业经济的繁荣。明代万历年间，忻州兴起酿酒业，清代忻州城内设有木器店，制作衣柜、农具等。明末清初忻州的副食加工业、豆腐坊、粉坊、酱坊、醋坊、干货铺等作坊和店铺遍及城乡。商业方面，明代开始向外销售薪木和石炭是忻人经商之始。清代忻州土满人稠，据州志载："乾嘉之间，习于边情者，贸易蒙古各部落及西北口外各城，有无相通，权其子母获利倍蓰。"忻人依靠近边获利，与蒙古诸部开展贸易。获利后，多回当地开设店铺。清末，忻州钱庄、账庄、布庄、绸缎店、杂货店、粮店等遍布州城。



忻州古城南城门瓮城

忻州古城的多维功能

（一）军事功能

忻州南界太原，故而忻州城是从北部进入山西中心地区最后的城池。《忻州直隶州志》载："三晋为神京右臂，忻郡又为省会藩屏，南接太原，北通沙漠，左出右入实省北一大都会。"另外其北通雁门、偏关、宁武，是三关的中枢调度之地和后勤保障基地。《忻州史话》称："三关与忻州之间，构成犄角之势，形成扇面，连通一气。三关像指，忻州如掌，进则如掌使指，迅速有力，退则坚实如拳，牢不可破。"

另外，从忻州本身所具有的地势条件来说，境内关扼河贯，地形复杂，南有石岭赤塘作犄角之势，北有依山傍水的忻口要隘，且云中牧马双流合抱，历来为兵家必争之地。州志载："忻境近边，当晋北孔道，自汉迄明，征战不息，民困极矣。"统计忻州城的军事斗争，北魏正光五年（524年），秀容牧子尔朱荣率兵攻城；隋末刘武周造反，攻陷忻州；唐武德七年（624年），苑君璋引突厥进犯并州，在忻州大肆杀戮，民不聊生；武则天垂拱元年（685年），阳曲道行军总管淳于处平在忻州与东突厥首领展开激战；唐景龙二年（708年），东突厥侵犯并州，在忻州大肆抢掠；唐中和元年（881年），李克用占忻州；宋宣和七年（1125年），金朝粘罕陷忻州；金贞祐二年（1214年），蒙古军攻破忻州，残杀忻

民，史称“蒙古屠城”；明正统十三年（1448年），蒙古瓦剌部太师也先，率骑兵转掠至忻；嘉靖二十二年（1543年），蒙古土默特部骑兵，大肆掳掠忻州。忻州战事频繁，少则三年，多则七八十年，必有兵祸。由此可见忻州战略地位的重要。

除却忻州的战略价值外，忻州城本身的建筑也具备军事防御价值。从诸多军事斗争中可知，忻州战事多因处于边地，少数民族入侵所致。为了抵御侵略，维护安定，故而从明到清的“三展卧牛城”之时，忻州城进行了大规模修缮，在原来加固城墙的基础上，增设了炮台、箭楼、瓮圈等具有军事性质的建筑。万历二十四年（1596年），修建忻州城的城墙也由土垣变为砖石建筑，其防护功能大大加强。州志载：“城墙全部包以砖石，城高四丈二尺，石基八尺，周两千一百九十丈。”同治七年（1868年），时任忻州知州的戈济荣对忻州城进行了修整。此次修城主要是在四门外增设了瓮圈。《武经总要·守备》云：“其城外瓮城或圆或方，视地形为之。高厚与城等，为偏开一门，左右各随其便。”可知，瓮城的作用就是方便守军从城上各个方向歼灭敌军。除此之外，瓮城墙上还筑有箭楼，以作进一步防护。由此忻州城的军事防卫功能不断加强。

（二）经济功能

忻州城的经济贸易价值体现在清末民初忻商的蓬勃发展中。忻州地处晋北交通枢纽，也是晋北的商品集散地以及物资中转地。如晋商开辟的茶路，《筹办夷务始末》载：“此项千两朱兰茶，专有茶商由建德贩至河南十字店，由十字店发往山西祁县、忻州，由忻州而至归化，专贩与向走西疆之商，运至乌鲁木齐、塔尔巴哈台等处集卖。”可见，忻州是茶商运茶必经之地。其中有一条西路，西路又一分为二，即从忻州出发，途经太原、临汾、运城、风陵渡、西安、兰州、武威、张掖、酒泉，再到新疆的大西路，以及从忻州出发直达本州西八县和陕甘宁青区的小西路。忻州处在这条商路必经之口，茶叶、绸缎、土布、粮食等货物源源不断地过境，成为各地货物集散转运之地。如忻州商人从河北省获鹿县将土布贩运到本境，将杭州、平津的绸缎、茶叶、烟酒、食糖、杂货也运到本境，除境内销售一部分外，其余的转运西路新疆等地和北路归化等地以及往东北销售。还有将茶叶转运到蒙古、俄国销售的。而后，又把西路的马、骆驼、牛羊驼毛、羊皮、白银、金砂、葡萄干和各种名贵药材（枸杞、麝香等）再运到忻州销售或由忻州转运北平、天津、杭州等地销售。粮、布、茶、盐、畜各类商品南来北往，故而忻州城成为经济交通要冲和南北商品集散地。

（三）艺术功能

忻州古城内的传统建筑类型丰富，具有较高的艺术价值，主要类型有防御建筑、纪念性建筑、民居建筑、宗教建筑等。

其中防御性建筑主要为四门城楼。四

座城楼以北门为主，规制比较大，南门次之，东西两楼较小。楼体为三檐歇山式。顶部脊高坡陡、角檐飞翘，梁架斗拱构筑精巧，牵制密合。

纪念性建筑主要有各式匾额。多是为表彰某些杰出人物而赐，内容多为赞美之词。

街巷名称	匾　额
石狼巷	昂霄坊
	厥功修身
周家巷	周氏矜式
	公益梓里
打磨巷	百业臻荣
	精勤信必
草市巷	忻郡兴宜
	高步九原
泰山庙巷	岱岳神祇
	五谷其丰
秀容巷	雅出秀容
	人文蔚起
关帝庙巷	义薄云天
	帝君气象
东顺城街	二星坊
	九原驿
大东街	鹏程万里
	民风乃厚
兴寺街	太平兴国
	旌贤坊
文庙街	兴贤坊
	大成至圣
南街跨街牌楼	太仆正卿
	祖孙继美
南街(跨街牌楼)	连登科第
	进士坊
北街(跨街牌楼)	鲲奋春溟
	鹗横秋汉

（此表格来源于《老忻州·名胜古迹》）

民居建筑保存较为完整的有周家巷郭氏老宅与打磨巷周家老宅。这些宅院多为多进院落格局，占地广阔，院内装饰精美、配置齐全。或有精美壁雕砖雕，或有古色古香的鹅卵石甬道，艺术价值颇高。

宗教建筑具有特色的有关帝庙、天主教堂、财神庙、火神庙、岱岳殿、泰山庙、文殊寺、奶奶庙、龙王庙、金洞寺、龙泉寺、兴国寺等。

忻州古城处于游牧民族与农耕民族的交汇之地，自古就是兵家重地，因此其建筑风貌明显区别于晋中、晋南地区。与晋中、晋南地区不同的是，忻州古城的建筑略显朴素简洁。这种建筑特点的形成，一方面是源于其地理位置。忻州处于晋北地区，气候较之晋南为寒冷地带，故而建筑色彩偏暗。另一方面与古城崇尚俭朴的民风有关。忻州古城的墙壁颜色较素。如秀容书院、三家店等群组建筑的山墙、后墙，还有民居建筑的后墙、山墙以及寺庙祠堂的墙壁，特别是九原岗片区的窑洞式建筑，就是大量运用了灰瓦素壁的色彩。这些均体现了古城建筑所具有的艺术价值。